

中日吸收外来文化的不同模式

黄 秋 生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存在不少差异。中日两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成功吸收外来文化，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回顾中日两国发展历程，我们发现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是两国获得成功的共同特点。但是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中日两国存在两种不同模式，也因此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命运，付出不同的历史代价，最终两国异曲同工，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现在两国经济总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三位，出现所谓“日本奇迹”、“中国奇迹”、“日本模式”、“中国模式”¹⁾的研究热潮。那么中日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呢？这两种不同的吸收模式谁优谁劣？应该如何评价？探讨这些问题，显然是有意义的。这不但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中日两国如何相互正确评价对方和正确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问题。有关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和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研究，在日本和中国都已有不少研究，但都是强调了日本如何比中国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且进行比较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两国吸收外国文化的不同模式的探讨，说明两国虽然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不同，但最终都达到了现代化转型的目的。同时中日两种吸收外来文化各有优缺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一、中日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回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²⁾这正是中国精神的写照。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坚韧不拔，同时也十分开放包容，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精华。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可以说贯穿整个中国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取得辉煌历史成就的重要原因

- 1) 本人并不十分赞同“中国模式”这种提法，理由很简单，中国其实还没有固定模式，还在改革、变化和发展中。中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另外，西方有人说是“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是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内有人认为既然“中国模式”既然这么优越，那就不用改变了，不必改革了。本文内容涉及的“中国的模式”，并不是西方所说的“中国（发展）模式”，而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
- 2) 这个句子出自孔子为《周易》写的《象传》。象传，分为大象、小象。大象是解释卦象立义的，小象是解释六爻辞的。这个句子，分别出自乾坤两卦的“大象”。（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之一。从一世纪左右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到今天改革开放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秀成分，无不体现了中国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这个特点。

日本更是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著称，可以说一部日本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历史。

（一）、中日两国各自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几个主要时期

本文将中日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各分为三个主要时期进行考察。

中国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一个时期是在一世纪左右到整个唐代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这一时期，虽然中国文化处在当时非常先进的地位，但中国仍然以非常开放包容的胸怀，积极学习和吸收印度的佛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吸收外来文化模式的基础。那就是注重文化深层结构的精神文化的吸收，并用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去融合外来文化，最后同化为新的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没有全盘照搬外来文化，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谨慎地选择取舍，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二个时期是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面临极大的危机，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求存救亡，中国积极学习西方文化，所谓“西学东渐”。在这期间，中国也曾有过学习和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经历，但最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一时期主要是吸收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也继承了吸收印度文化时的成功经验，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道路。

中国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后来幼稚的左倾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影响，生产力得不到有效的发展，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于是，中国再次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中国吸收印度文化所形成的成功模式得到进一步确认，中国没有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而是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优秀成分——市场机制，初步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日本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化改新前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这一时期日本全面模仿和吸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他文化，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和成就。同时奠定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主要模式的基础，那就是在内容上注重文化表层结构的物质因素和实用技术，在方法上采用全面移植外来文化，再加以改良，最后与原有文化多元并存的方式。

日本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二个时期是明治维新前后。这一时期日本“脱亚入欧”，学习吸收了欧洲先进文化，使日本走向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吸收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模式再次得到成功的运用，有了第一次移植中国文化的成果经验，这次更加驾轻就熟，在实践中又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功。

日本第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是二战结束后对美国文化的吸收。战后，日本更是积极学习吸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大量移植和吸收美国文化，使日本走向了平等、自由、民主和富强。

回顾中日两国各自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和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吸收模式。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在内容上重视深层文化、精神文化的吸收，通过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高度融合，最后统一、同化为新的中国文化。在吸收的方式上往往要通过慎重选择取舍，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然后用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和改造，通过融合和同化，最后形成新的中国文化。其过程可以概括为选择取舍——实践改造——统一同化。中国这一模式并不十分重视表层文化、物质文化的吸收。而日本的吸收外来文化模式与中国吸收外来文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它在内容上重视表层文化、物质文化和实用技术的吸收，采用全面移植、加工改造、最后与原有文化并存的方式，也就是说外来文化最终没有和日本原有的文化水乳交融，产生一种新的日本文化，而是和原有文化并存下来。其过程可以概括为：全面移植——加工改造——多元并存。日本的吸收模式不太注重深层文化，精神文化的吸收。

这两种模式的特点在中日两国的语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对待外来语一般是要根据意思加以翻译，没法根据意思翻译也要采用半音译半意译或让人一看就能联想其意的方式来翻译，并且用统一的汉字表示。如 computer 翻译成“电脑”，多么形象化、中国化，“coca-cola”翻译为“可口可乐”，让人顿生想喝一口的念头。而日本完全是音译（明治时期曾有借助汉字意译，后来基本上就变成音译），不管是什么东西，也不用想太多，直接按照外国人的读音先拿来，再漫漫消化，而且也没有统一的文字表示，而是用片假名来专门单独表示是外来语。

汉语用的全是统一的方块文字，日语是几种文字并存。有汉字、平假名、外来语（片假名）、甚至有罗马字（如汽车品牌），多种形式并存。汉字是从中国引进的，而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日本借用汉字偏旁的草书和楷书而来的（也可以说是日本的发明创造）。单从表面看好像都不是日本的东西，那是不是日语就没有日本固有的东西呢？当然不是，发音和语法的的确是日本的，只是从文字表面上看不出来。（日本文化往往给人这样的错觉，以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日本的。其实只是一般看不到。如日本精神、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神道等日本深层结构的文化）。

日本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无不体现了多种文化并存、混合的特征。吃的有“洋食”、“和食”和“中华料理”、住的有洋室、和室（其实也包含古代中式元素）。穿的有洋服、和服（其实也是来源于唐服），过节有中国的节日（如日本有些地方还过“七草”“七夕”、“中秋明月”等中国传统节日）、日本的节日和西方的节日，种类繁多。再比如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日本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存在，并与西方经济学平起平坐。还有，日本的公司看上去更像社会主义国家公司，更好混。终身雇佣、年功系列，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贡献不要紧，很容易出现滥竽充数。这种多种文化并存的

现象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

(二)、中国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

(1)、吸收印度佛教，成功地创造中国特色佛教

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在中国汉唐时期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汉唐时期虽然中国文化领先于世界，但中国仍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吸收印度佛教文化。中国吸收佛教文化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慎重的选择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大乘佛教主张自度度人和主张入世舍身，普渡众生，非常适合中国人传统的儒家的入世思想和注重现世生活的习性，因此根据当时的国情，没有选择印度的小乘佛教，而选择了大乘佛教。这一正确的选择，奠定了后来取得重大成功的基础。中国选择了大乘佛教以后，就对佛教进行实践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改造。首先是组织人力大量翻译经书，再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去解释佛教。比如用传统的“无”“生死”“无为”分别去解释“空”“轮回”和“涅”等。其后在中国出现以自家的理解去阐释佛教的风潮，产生了各种宗派的佛教，出现了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后来又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并在日后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禅宗。禅宗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对佛教文化的选择、改造、同化的最好体现，是佛教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佛教。而在思想方面，儒家从佛学中吸取营养，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宋明理学。禅宗和宋明理学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那就是注重深层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吸收，最终和中国文化融合为一体，产生新的中国文化。这一模式不太重视表层文化，物质文化的吸收。

(2) 学习吸收社会主义文化，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救亡求存，又一次掀起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这一次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缺陷和弊端，为了使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对本土文化进行彻底地改造，甚至不惜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了代表腐朽落后旧文化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落后的中国旧传统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一直到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最终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曾一度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但最终选择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是全盘照搬苏联，照搬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化贯通的产物，是对外来文化的发展和创造，并产生了有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体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等思想，都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创造。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也体现了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注重深层文化和精神文化，重视中外文化高度融合，重视统一同化的中国模式。

（3）改革开放，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中国人发现了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助长惰性，吃大锅饭，没有竞争，缺乏动力，缺乏效率性。由于有这种局限性，再加上后来左倾思想和各种运动的影响，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生产力得不到有效的发展。于是在 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中国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吸收外来文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一开始是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选择取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没有照搬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精华——市场机制，然后加以消化创造，同时保留社会主义、传统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多种所有制并存、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然后统一同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开始充分发挥市场的威力，同时政府进行有效的管控、调控——宏观调控。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被誉为中国奇迹。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国在这次改革开放、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模式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当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最终中国还是要以市场驱动力为主，同时将走向真正的法治社会。最终建立起中国的价值观，伦理观和社会秩序。

由此可见，中国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都是采用这样的模式，那就是在内容上重视深层文化、精神文化的吸收，通过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高度融合，最后统一并同化为新的中国文化。在吸收的方式上往往要通过慎重选择取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其，然后用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和改造，通过融合和同化，最后形成新的中国文化。其过程可以概括为选择取舍——实践改造——统一同化。

（三）、日本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回顾

（1）、大化改新前后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吸收移植

在明治维新以前，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化都是日本学习和吸收的对象，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早在 3 世纪左右，中国的汉字和中国的经典就以传入日本³⁾。尤其是 592 年推古女皇即位，日本进入推古王朝以后，圣德太子摄政，制定了“官位十二阶”，以及制定《十七条宪法》，推行改革。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又毗邻日本，中国文化自然就成为日本全面学习和吸收的对象。日本大化改新前就有很多日本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他们带回了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对大化改新时期新体制的设计起了重要的作用。大化改新后，日本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当时日本是采用了全面模仿的方式吸收隋唐各种文化，涉及范围广泛，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到日常生活的饮食文化、生活方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非常重视表层文化和物质文化以及实用技术的吸收。包括律令、文字、书法、诗歌、饮食文化、技术、拳术、

3) 《日本书记》记载：归化日本的百济学者阿直岐邀请在百济的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和《千字文》去日本并当了皇太子的老师，从此日本贵族开始学习中国文化。

唐服、榻榻米等,甚至城市建设(如京都就是模仿中国当时的长安建起来的),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几乎是把整个中国都搬到日本。尤其是对唐代法律制度的移植,几乎是全盘照搬。日本的《大宝律令》其实就是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的移植,只做一些简单的修补。当然,日本学习了隋唐文化,并不是丢弃原来的日本传统文化,日本在全面移植了隋唐文化后,为了适应日本社会,进行小修小补后与原来的日本文化并存,共同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存留下来,直到今天。而中国由于社会变迁和旧文化更替,今天早已不见隋唐时期物质文化的踪影,但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保留(如中国古代的木工建筑技术,漆器,丝绸作坊等)。

(2) 明治维新对欧洲文化的移植

鸦片战争后,日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腐朽和落后,开始转向吸收欧洲西方文明。有了大化改新时期第一次学习中国文化的经验,日本明治维新后,就驾轻就熟,开始全面吸收西方文明,也是从衣食住行到国家法律制度等等,进行全面移植。明治维新不久,日本就大量移植和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在政治制度方面,模仿欧美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日本式的立宪议会制度。在民事法方面,组织人力对当时的法国民法典进行翻译,直接作为日本民法典。后来发现德国民法更适合日本,于是日本又移植了德国民法,制定了日本民法典。与此相对照,中国经过革命和建设,经过改革几十年,到今天还没有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3) 战后日本对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移植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日本就开始对外侵略扩张。当时,日本为了夺取亚洲领导地位,把矛头对准了亚洲强国的中国,对当时已经百孔千疮的中国发动了侵略,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此中日两国结下了不解之仇,最后战争以日本失败告终。战后,美国扶植日本重新发展起来,美国的制度又成了日本仿效和移植的对象,于是美国文化,美国的选举制度,政治制度,美国的民主自由,几乎美国的一切文化都变成了日本模仿和吸收的对象。

由此可见,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模式与中国吸收外来文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它在内容上重视表层文化、物质文化的吸收,形式上采用全面移植、加工改造、与原有文化并存的方式。其过程呈现出可以概括为:全面移植——加工改造——多元并存。

二、中日两国吸收外来文化不同模式的评价

从时间和成本上说: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所需时间短、见效快,是一条省时省力的捷径。重视吸收表层文化、物质文化和实用技术,这可能源于日本人的“工匠精神”⁴⁾。

4) 邱永汉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更具有商人气质,日本人更具有工匠气质。

不太重视深层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吸收，不像中国那样注重灵魂和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的吸收。因此吸收外来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和轻松，没有遇到太大阻力，不须付出昂贵的历史代价。加上采用的方式是全面移植，因此速度快，所需时间短。如日本大化改新通过对唐朝文化的移植和模仿，迅速地从原始的氏族社会跃进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社会，成为当时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唐朝的强国。又如明治维新日本通过移植西方先进文化，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路程，成为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而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则与日本相反，由于注重深层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吸收，因此社会阻力大，时间长，见效慢，成本高。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往往要走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有时甚至要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中国吸收佛教文化，用了将近上千年才来消化。又如“五四”运动以来，为了吸收西方文化，中国对腐朽的旧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改造，最终通过一场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后来又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一度使传统中国文化几乎荡然无存。中国人民，为了实现现代化转型，经历了太多沧桑和苦难，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才换来了今天这种局面。

从吸收的内容上看，日本重视物质文化和实用技术的吸收和采用多元文化并存的方式，因此往往使日本呈现物质文化极富多样性。日本的、中国的、西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多姿多彩，应有尽有。各种商品充斥市场，琳琅满目。而且通过日本化精致加工后，商品美轮美奂，精致可爱，技术也十分先进。而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则与日本相反，是部分吸取，而且由于不重视吸收表层文化和物质文化，没有注重实用技术的吸收，造成商品没有日本那么多钟多样，再加上没有日本人对产品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没有通过精致化加工，所以往往中国的产品不够多样，不够精致。

从吸收的范围来说，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吸收范围窄，是有选择地吸收，只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并不全盘照搬。而日本学习外来文化是全面的。从中国几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从来就没有全盘照搬。中国是在固有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并加以同化，最后成为新的中国文化。无论是中国的禅宗，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体现了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吸收其优秀成分，并融化贯通，通过同化，最后形成新的中国文化。

而日本无论是封建时代对中国文化的吸取、还是明治维新时期对欧洲文化的摄取、还是战后对美国文化的引进，一开始都是全面移植，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制度到社会民生生活、衣食住行等，几乎涉及方方面面。

从吸收外来文化的深度来说，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往往比较注重吸收表层文化，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由于自身还没有产生高度的文化，与外来文化差距巨大，没法用自己的固有的文化去消化和融合外来文化，所以日本往往采用跃进式的移植方式。如通过大化改新日本从原始氏族社会一跃进入封建社会，明治维新后又在很短时间内从封建社

会跃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来不及也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去消化外来文化，没有和原有文化充分融合。有学者比喻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就像是在原来日本的躯体上披上一件新的外来文化的衣裳，需要时拿来披上，不需要时也可以随时脱掉⁵⁾。因此，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往往比较表面化，缺乏统一性，没有内在的驱动力，缺乏持久性。日本往往在狂热吸收外来文化一段时间后就失去动力。比如大化改新后不久，日本就开始对中国文化失去热情，而出现了所谓的“国风文化”；战后狂热学习西方后，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就出现了“失去的20年”的疲惫症状，明显出现了制度疲劳。另一方面，日本这一模式还容易产生盲目崇拜，盲目仿效，不求根本的弊病。关于这一点夏目漱石早在小说《三四郎》中指出：“文明开化”光有其表，不学其内的虚伪性和欺诈性。而森欧外也在《大发现》中批评“只要是西洋的，就什么都是好的”的错误思想。永井荷风也在他的日记里批评当时人们那种以为只要在外表上模仿西方，就能创造出伟大的日本文化的幼稚的社会风潮。另外，由于日本注重物质文化的吸收而忽视了对精神文化的吸收，所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往往产生不协调现象。“物质文化已经发生大跃进，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却产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使得日本民族出现许多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⁶⁾

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统一性强，原有文化和新的外来文化高度融合为一体，具有源源不断的内在驱动力，不容易产生制度疲劳。中国对佛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改革开放后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吸收、融合和创新就充分说明中国吸收外来文化模式的这种优点。日本经过起初的高速发展后，显然处在制度疲劳中，而中国却具有极大的动力继续发展，加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其前进的步伐是日本没法比拟的。而且，由于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经历了屈辱、惨痛的历史教训，决定了中国一旦形成新的文化将不会逆转，不会倒退。

中国吸取外来文化的模式往往涉及人们内心的灵魂深处，因此常常出现矛盾和斗争，新旧文化斗争激烈，为了达到融合和同化，有时要付出昂贵的历史代价，而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是表面的，内心还是日本“魂”。对中国来说，吸收外来文化是要学习一种新的指导思想，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以便指导社会发展和个人的行为。而日本吸取外来文化更注重实用，更注重运用技术和产品。

5) 石田一良著，许极焯译《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上海外语出版社1989年 第267—268页

6) 周振鹤《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三期 第70页

三、中日吸收外来文化不同模式的必然性和互补性

（一）中日吸收外来文化不同模式的必然性

中日两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采取两种不同的模式是由两国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形态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1、地理环境和国家形态不同，国家规模不同：日本是个岛国，民族单一，国家规模小，加上民风淳朴，服从性强，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内部阻力小，上下一致，容易全面模仿和移植外来文化。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国家规模大，加上个人本位、家族本位、生活本位的传统意识，吸收外来文化面临阻力大，很难全面移植外来文化。

2、文化类型不同：中国文化是世界几个原生型文化之一，中国自古就创造了自己的辉煌的中华文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去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因此中国吸收外来文化是有选择性的，注重深层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吸收，不是对外来文化的全盘移植。日本文化是输入性文化，本来就是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来不及也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去消化和融合外来文化，因此只能先采取全面移植外来文化，再经过加工改造，最后和原来的文化一起并存下来的方法。

（二）中日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不同模式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中日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各有优缺点，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两国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对中国来说，应该在保持自己原有吸收外来文化模式优势的同时，学习参考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模式的优点，在重视深层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同时，也要顾及表层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吸收，使得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商品更加琳琅满目，尤其是要注重实用技术的吸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另外还可以学习日本人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把产品做到精致甚至是极致。而对日本人来说，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也值得学习。日本如能在保持原有重视表层文化，物质文化的同时，注意深层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吸收，做到原有文化与外来文化水乳交融，日本将会获得更持久的发展动力。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都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但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吸收模式，中国注重深层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吸收，通过取舍选择，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同时用深厚的文化底蕴去消化和改造外来文化，通过统一和同化，最后形成新的中国文化。而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往往比较注重表层文化和物质文化以及实用技术的吸收，常常采用全面移植外来文化，再通过加工改造，最后和原有文化一起并存下来的方法。中日两国各自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时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同时中日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各有优缺点，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日两国应该放下偏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书籍

-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社会思想社刊 1967年
土居健郎《依赖心理的构造》弘文社 1992年
咏持德一《论汉族的性格》泰山房版 1940年
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4年
马家骏 汤重南《日中现代化的比较》六兴出版 1988年
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
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讲谈社
森田 宪 陈云《中国经济改革与资本市场》东京 多贺出版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

论文

- 周振鹤《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三期
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世界历史 2001年第3期
李 卓《古代中华制度文明在日本的结局——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的再认识》东北亚学刊 社会文化 2012年创刊号

中国と日本における外来文化吸収様態の比較研究

黄 秋 生

中国と日本は一衣帯水の隣国として、ともに輝かしい文化を持っている。両国のそれぞれの歴史を振り返れば、積極的に外来文化を取り入れてきたことは、両国に共通している点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

本稿では、中国における外来文化吸収の歴史を、漢唐時代における仏教文化の吸収と、近代における社会主義文化の吸収、及び改革開放以来、市場経済を中心とした資本主義文化の吸収という三つの時期に分けて考察し、そして同様に、日本の外来文化吸収の歴史も、大化の改新前後における中国文化の吸収と、近代における西洋文化の吸収、さらには戦後アメリカからの自由と民主主義文化の吸収という三つの時期に分けて考察することにより、中日における外来文化の吸収には、二つの違ったモデルが存在していたことが認められることを論じたものである。

中国における外来文化の吸収モデルは、内容的に文化の深層構造にある精神的な要素を重んじ、方法的には融合と同化を重視していた。一方、日本における外来文化の吸収モデルは、中国とは対照的に、文化の表層構造にある物質的な要素、実用的な技術に重点を置いて、方法的には外来文化の移植改良と国内文化の多元的併存を重視していた。

中日における外来文化の吸収にこのような違った二つのモデルが存在していたため、両国はそれぞれの違った歴史的なプロセスを歩んできたが、結果としては中国も日本もともに輝かしい成功を収めてきた。

中国と日本における外来文化の吸収モデルは、それぞれメリットとデメリットがあり、相互補完性が強いので、中日両国は、偏見をなくして、お互いに尊重し、学びあい、相手の長所を取り入れ、自分の短所を補い合うことが望ましい。

中日両国における外来文化吸収の、それぞれの違ったモデルを研究し考察することは、学術的な価値があるだけでなく、中国と日本の相互理解にとって、いかに客観的に相手を評価し、いかに適切に相手との関係に対処するかという現実的な価値もあると思われる。